

宋 进 著

邓小平理论的品格研究

DENGXIAOPINGLILUNDEPINGEYANJIU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的品格研究

宋 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邓小平理论的品格视角,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品格、创新品格、时代品格、思维品格、民族性品格、政治品格和精神品格等,彰显邓小平理论品格的力量及其启示。从道与人、前与后、上与下、正与负、古与今、中与外和知与行等多方面地展开,从而由对邓小平理论的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所必然,实现对邓小平理论知、信、行的有机统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理论的品格研究/宋进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ISBN 7-313-02507-6

I. 邓… II. 宋… III. 邓小平理论-研究 IV. 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731 号

邓小平理论的品格研究

宋 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张天蔚

常熟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8.75 字数:249千字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313-02507-6/A·05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思想家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家个人生平活动、实践与其思想往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某一理论必须关注其创立者,所谓道与人相结合。这里的道,是指道理、理论;这里的人,是指人格形象、人格力量。

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除了要从整体上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之外,还应该紧密结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来认识其科学理论,将其革命实践与理论建树融为一体。

从主体接受的角度来说,人们对某一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的认同和接受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带有明显的主体评价,这就一方面要求理论本身具有充分的真理性,能使人们在实践检验中由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并升华为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要求理论本身彰显人格化魅力,能够反映出理论主要创立者的高尚品格和风范,使理论本身具有更充分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这就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人格的力量感染人。人格、品格就是力量,从更高意义上说,这句话比知识就是力量更为深刻。

真正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伟大理论,必然表现出真理与人格、品格的双重感召力,能够以真理的力量和人格、品格的力量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启示。邓小平理论就是这种具备双重感召力的科学理论。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不仅以他创立的光辉的革命理论指引着我们,而且以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感召着我们。”江泽民强调邓小平“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①特别体现在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这就从深层次昭示我们:邓小平理论具有真理的力量和人格、品格的力量合二为一、融为一

^①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 页。

体的科学的力量、榜样的力量。

江泽民的这一思路是一贯的。1993年12月26日,他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3年多后,他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一以贯之地指出:邓小平“他的风范同他的事业和思想一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这就说明,邓小平理论具有真理和品格的双重彰显,使我们不仅获得真理性感悟,而且获得人格性感悟,从而产生双重认同:既在理性层面上认同于邓小平理论所蕴含的科学真理,又在情感层面上认同于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人格精神;既在理论层面上认同于邓小平理论的真理价值,又在人格层面上认同于邓小平理论品格的力量。这样的双重彰显、双重感悟和双重认同是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应当达到的境界。

理论和品格作为主体的属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这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品格是通过个体的思维、行为体现出来,它既包括感性因素又包括理性因素;而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则凝聚着群体的经验,体现着普遍性的理性认识。但是,在同一人身上,品格与理论又是相互渗透的。比如,人品的层次,主要体现为道德的培养,而道德修养又与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选择密切相关;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自觉选择与确立,又离不开对其内容的理论把握。因此可以说,人品是付诸实际行动的理论。1977年在决定恢复邓小平职务的中央全会上,“他这样讲: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①这种态度、这种选择,这种品格,是邓小平创立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必要条件。又如意志与理论的关系,人的意志坚定与否,不但受其生活环境的影响,而且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和观察能力紧密相连。理论上的坚信,才有行动上的坚定。

^①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邓小平勇敢、坚韧的意志,既在于几十年艰苦卓绝的为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的奋斗和磨练,更重要的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持着他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挫折打击,都能勇敢地面对它们、战胜它们,也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激励着他勇敢地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而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江泽民说:邓小平“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①

理论与品格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其结合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其 1872 年出版的著名的《品格的力量》一书中写道:“体现在思想和行动中的品格是永垂不朽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会数百年扎根于人们的心灵,并最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发生作用。”^②联系到邓小平、邓小平理论,用江泽民的话说:邓小平“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③

真理与人格、理论与品格的动态关系,聚焦在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上,达到了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的境地。这主要表现为:第一,邓小平理论既是科学理论的深刻阐发,又是实践探索历程的真切记述;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方法论的启迪。其中方法论的运用和实践过程的记述在思想方法和科学态度方面强化了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性和说服力。第二,邓小平理论既体现出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和深刻认识,又体现出邓小平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形成的革命风格。第三,它既能以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给人以深刻的理论启迪,又能以人格精神给人以深切的人生昭示。这就是说,邓小平的人格、品格是他走向真理与伟大的重要因素,邓小平理论又是他的人格、品格得以升华和彰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向成功与辉煌的重要条件、结晶和载体。于是,真理性内涵与人格

①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 页。

②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出版,第 20 页。

③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 页。

性内涵的有机融合铸造和展现了邓小平理论的品格。

因此,本书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就不是止步、满足于描述的认知层面,而是从理论品格的视角思考:邓小平为什么、靠什么创立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三落三起”为什么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为什么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又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为什么说邓小平的风范同他的事业和思想一道,要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等等。

本书从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品格、时代品格、创新品格、思维品格、民族性品格、政治品格和精神品格等诸方面,来解读邓小平理论,彰显邓小平理论品格的力量及其启示。从道与人、前与后、上与下、正与负、古与今、中与外和知与行等多视角地展开,从而由对邓小平理论的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所必然,实现对邓小平理论知、信、行的有机统一。

“判断一个民族的品质不仅要考虑伟人的品格,而且要考虑在国民主体中发生影响的品格。”^① 因此,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②,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我们,把邓小平、邓小平理论的品格化为我们民族的品格,用邓小平的智慧化为我们的智慧,用邓小平的信心增强我们的信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①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②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目 录

一、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品格	1
1-1 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	1
1-2 实践的生长点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7
1-3 邓小平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15
1-4 邓小平理论的实践观及其特色	20
1-5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	30
1-6 邓小平理论实践品格的两大启示	37
二、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	42
2-1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品格	43
2-2 “四新”与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机制	55
2-3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	65
2-4 邓小平理论创新品格的重要方法论	81
2-5 邓小平理论创新品格的启示	85
三、邓小平理论的时代品格	89
3-1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与时代的变化	89
3-2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依据	96
3-3 邓小平理论对新的时代特征的回应	106
3-4 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意义	116
3-5 邓小平理论时代品格的启示	118
四、邓小平的理论思维品格	127
4-1 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转变	127

4-2 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	133
4-3 邓小平的求实思维	142
4-4 邓小平的创造性思维	148
4-5 邓小平的系统思维	155
4-6 邓小平理论思维的时代性特色	161
4-7 邓小平理论思维品格的启示	165
五、邓小平理论的民族性品格	168
5-1 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169
5-2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历史论证	171
5-3 邓小平理论民族性品格的彰显	177
5-4 邓小平理论民族性品格的特色	182
5-5 邓小平理论民族性品格的新发展	190
六、邓小平理论的政治品格	193
6-1 邓小平“讲政治”的主要内容	193
6-2 邓小平理论政治品格的特征	208
6-3 邓小平理论政治品格的启示	215
七、邓小平的精神品格	218
7-1 邓小平精神品格的来源	219
7-2 邓小平精神品格的内容	223
7-3 邓小平精神品格的启示	237
结语 邓小平理论的魅力与创立者的人格力量	244
附录一 关于邓小平理论教学中十个关系的思考	256
附录二 引导大学生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思考	264
主要参考文献	269

一、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品格

“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

——江泽民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②。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底蕴在于它具有伟大的实践品格。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彻底的实践品格。它深深植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科学体系。纵观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以“理论论证”为特征，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战略策略”为特长，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应用的战略性”为特点，而邓小平理论则是以“具体的实践性”为特色。

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彻底的实践品格。

1-1 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在实践中产生。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毛泽东形象地概括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一著名论断。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它同样来源于实践。但并非先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才有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批判考察，即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对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对立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一方面，它是时代的产物。“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① 通过实践批判——立足于实践和付之于行动的批判，使理论获得一种现实性的品格。这使它内在地包含着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得出的确定的、已经证明和已经对象化的方面，这决定了它是一个脚踏实地，与过去和现实实践紧密相联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它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而产生，就不可能直接总结、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经验，因而它所立足的实践基础有其局部性、有限性和不完全性，这就使它又包含着有待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实践决定的不确定的、尚待证明和尚未对象化的方面。这决定了它又是一个不断超越既定的现实而与未来现实紧密相联的活生生的开放性理论。

任何科学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恩格斯认为，科学发展的形式是假说。假说往往是在有一定的实践根据但又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此时提出假说，才显示它的科学价值。列宁也认为，马克思在 19 世纪 40 年代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天才的，但“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②。列宁还认为，这个假设经过《资本论》的论证，就成为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但是，列宁这里所说的检验不是实践检验而是理论检验。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大致要经历假设——理论论证——实践检验过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时，他们的贡献在于对这种假设作出了科学理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41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 页

论形态上的论证,因为他们是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上阐明了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设计的未来新世界具体内容的不同,而在于它们的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和依据不同。空想社会主义的依据是抽象的“理性”,具体表现为正义、公正、善和道德等一套普遍理性观念,以此来揭露和评判现实社会(当时的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并由此推知未来的合理的理想社会形态;而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现实理性”为依据的,它从当时现存的社会中,发掘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运动的种种规律,从而指出其内在矛盾和趋势。

1886年,英国费边社的一位领导人爱·皮斯,请求恩格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写一篇文章,简要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回信表示难以承担这一任务。他强调指出:“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① 在其他场合,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② 可见,社会主义既是制度、运动和理论形式,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进程。

巴黎公社的闪现,使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未能得到有效的检验。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在一国成为客观实际,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实践又从一国转向多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多方面成了现实。这就提供了直接从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认识社会主义的可能。

但是,现实社会主义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9~4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

第一，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生产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诞生，而是在生产力欠发达的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家中首先胜利。

第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普遍存在超越阶段的倾向使得各国不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从社会主义的一般要求来规划实际。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以后没有得到健康发展而是在各种“左”右倾向中不断松动社会主义的基石，使得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屡遭挫折而蹒跚而行。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试图通过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未能成功。1921年，列宁开始认识到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并及时调整了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底指出：“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①毛泽东此番话过去近30年后，邓小平进一步继续说道：“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这种僵化是与教条化相连的，即教条化是把理想原则文本化、模式化，使之脱离实际走向僵化。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僵化，即不顾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单纯从抽象的理论图式和国内外政治斗争需要出发，取消商品经济，急于求成地推行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使政治、经济和社会陷于畸形扭曲的轨道。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列宁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发生的悲剧性转折，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回归和强化；这一模式没有也不可能在当时的苏联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有种种不足的僵化的载体——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可以主要概括为三方面经验教训：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其一,形而上学。19世纪初一位德国诗人和哲人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然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却反复佐证:唯有理论之树常绿,才有生命之树常青。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那些基本的设想,而在于分析的方法。他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基本上是根据对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分析得出的,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具体设想原封不动地套到当代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其二,时空错位。社会实践是“社会的人”的实践。这种实践要受到一定时间、空间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有其适用的范围。从时间上看,它主要是根据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解剖而得出的;从空间上看,它主要着眼点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时空错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硬套到现实的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东西方之间的最大差异。

其三,主次颠倒。这就是人为地夸大了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斯大林不恰当地把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治革命的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企图通过“不断革命”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创造(革命)。但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过的,很少有伟大的历史人物能够在一生中对性质截然不同的两次大的挑战都作出成功的回应。毛泽东面对第二次创造(建设),出现了两重性:

一方面,给中国后来的改革提供的理论遗产,即理论生长点。毛泽东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并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例如,针对在苏联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针

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应”的观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针对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针对苏联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了权力下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针对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出了农轻重的建设安排;针对苏联文化界死气沉沉,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概括起来,就是“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这些观点虽然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很好贯彻,有的甚至向相反方向发展,但是提出这些观点毕竟在理论探索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的继续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邓小平在1980年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①

另一方面,毛泽东后来也犯了“左”的错误,实行“一大二公三纯”(实际上也是标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违背了历史理性,使社会主义关系在“大”、“公”、“纯”中失去了现实基础,大大超越了生产力而孤立“发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先搞革命,再搞工业化”的模式没有了,“革命”成为目的价值,代之以“先搞革命、再搞革命、不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的模式,从而导致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创造中的失误。历史把毛泽东未完成的事业交给他的一位伟大的战友和继承者——邓小平。

实践是有连续性的,我们不能割断实践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实践又是有区别的。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为己任,并为之提供理论指导的邓小平理论,只能诞生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又是历史实践的延续,并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是改革开放实践源出的历史前提和背景,它为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一个新的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①

1-2 实践的生长点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邓小平认为,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如果没有时代发展所造成的新的事实,如果没有根据中国国情回应时代挑战的新的实践,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但不是先知。他不是先提出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然后按照这套方案来改造中国。毛泽东认为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邓小平理论不是在书斋中或从“本本”上演绎出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制定完整的改革方案,离开了具体的改革实践不可能说明邓小平理论是怎样形成的。

马克思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一个观点:“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时说:这种观点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 邓小平当然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人。邓小平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既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过,又在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过的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带过兵,打过仗,领导过军事,指挥过军事,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当过总参谋长和中央军委主席;他是中共党内唯一参加过中共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经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次重大历史转折、实践经验十分丰富的党的历史的见证人;他是中共党内唯一的历经坎坷,三次被错误打倒,三落三起,后又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忠诚战士。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说到底是对“社会主义”在认识和实践上的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20 多年的历史进程,就是逐渐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认识和正确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第一大特征。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①在他看来,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等问题早已历史地解决了,不存在什么“不清醒”。“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才是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还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并不奇怪。毛泽东在 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他还讲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的过程。然后他深刻地指出:“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还举例 1960 年埃德加·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②

通过不断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经验,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 页。

②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8~301 页。